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百年

20 SHIJI ZHONGGUO WENXUAN
JIAZHIGUAN YANJIU CONGSHU

文学与
宗教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文学与宗教 / 谭桂林著 . —长沙 : 湖南教育出版社 , 2002

（百年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 百... . 谭... .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 1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6095号

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百年文学与宗教

谭桂林 著

责任编辑：符本清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643号）

湖南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32开 印张：10.625 字数：273000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 - 5355 - 3802 - 9/G · 3797

定 价：19.5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文学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必然包含着价值判断，文学家的赞赏与贬抑、肯定与否定都或明或隐地体现在作品的各要素中，形成文本的召唤结构，引导读者从审美活动中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于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价值判断与选择在作品中的体现尤其鲜明重要，因而20世纪中国文学评论相对而言比较重视从人生意义与价值选择的角度来评判作品。不过，由于时代本身的限制，以往的文学批评在价值问题的分析方面有两点局限是明显存在的：一、从严格的学科领域分界来看，价值观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同一般性的人生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以前的文学批评习惯于将二者混同起来有时甚至将价值学说完全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从而遮蔽了价值观念作为伦理学说的特殊性；二、在文明社会中，价值观呈多元形态，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有阶级意识形态的，也有以共同人性为基础的。以前的文学批评对价值观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方面，而对其他一些类型的价值体系则有所忽略。

最近，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几位教授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各种价值观念的爬梳整理与分析剖解，突出价值观念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独特性关系，显示出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具有的独特影响。一方面，为文学与价值观的密切关系确立一个历史性的依据，让人们从理论与历史中认识到，在文学中价值可以被重估、被解构，但是不可以也不可能被驱逐；另一方面，这一课题的研究也说明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主导性的价值体系，这种主导性的价值体系同其他各种价值体系之间既有区别，也有相通之处。这种主导性的价值体系如何包容并且充分利用各种价值体系来促进社会文明的多元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正是出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问题之关注，当课题组成员前来联系这套丛书出版事宜时，我们欣然答应下来，并初步拟定人文主义、传统文化、宗教伦理、市民文化、后现代主义等价值体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体现，作为这套丛书的主要内容。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来告诉人们，如果文学的领地只允许一种价值体系的存在，文学就无可置疑地会变得单调、枯燥与板滞，同样，在多元格局的价值形态中，文学家如果不能明确自己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文学也就难以完成它的人类文明建设的责任担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套丛书，我们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成果在编辑体例上作出了统一的要求，但在学术观点与写作风格上，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给作者一个自由与充分发挥学术个性的空间。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够较好地实现我们的出版构想与目的，并热切期盼着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2002年10月



作者简介

谭桂林，1959年生，湖南耒阳市人，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宗教与女性》、《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人与神的对话》、《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转型与整合——中国现代小说精神现象史》、《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谭桂林卷》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曾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省部级奖多项。

目 录

出版前言	(1)
绪论 宗教价值理念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建构	(1)
第一节 现代文学起源中的宗教文化背景	(2)
第二节 现代文学传统中的宗教价值理	(10)
第三节 宗教价值理念的互动、融合与自我调整	(21)
第一章 基督教价值观念与20世纪中国文	(28)
第一节 博爱：生命价值的起源	(29)
第二节 救赎：个体价值的此在承担	(48)
第三节 忏悔：灵魂深渊的价值呼求	(67)
第四节 苦难：价值实现的身心磨砺	(85)
第五节 漂泊：浪子回乡的精神之旅	(104)
第二章 佛教价值观念与20世纪中国文学	(132)
第一节 色空：人生本苦的价值认定	(135)
第二节 利生：菩萨行与作家价值体系建构	(152)
第三节 果报：自责自负与历史轮回	(172)

第四节 愍物宗情：佛性与人性的价值互补.....（187）

第五节 冥奥之思：禅心与现代文学的朦胧.....（204）

第三章 区域宗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218）

第一节 楚巫文化与20世纪湖湘文学.....（219）

第二节 伊斯兰教与20世纪中国西部文学.....（236）

第三节 喇嘛教与藏地文学创作.....（256）

第四章 宗教体验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神秘倾向

.....（282）

第一节 神秘体验的诗性特质.....（282）

第二节 现代作家的宗教体验与神秘倾向.....（291）

第三节 世界含魅认知的回归.....（300）

结语 与神对话：建构中国文学价值体系的新维度

.....（322）

参考书目.....（328）

后记.....（331）

绪论

宗教价值理念与中国现代 文学传统的建构

从文学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学的传统有大小之谓。大传统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由于语言、环境、文化资源等方面的共同性所形成的并且已经被民族文学所世代承袭的一些精神表征，小传统则是指在某一个历史时段中由于时代主题与文化资源方面的特殊性而形成的并且有可能融入大传统的一些精神特征。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就是这样一种小传统，因而我认为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一种思路，即不仅要刻意地去寻找现代文学传统同中国文学大传统之间的丝丝缕缕的关

系与同一性，而且要细心去发掘现代文学传统中所蕴涵的体现着这一时段中的文学思考最高成就的精神独特性。沿这一思路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那么，宗教价值理念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就必然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学大传统是在儒、道、释三家思想文化资源的互动中构成的，其中儒家文化以其经世致用精神在这一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道家文化则以其天人合一精神与儒家文化形成互补关系。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在其影响上与儒、道形成鼎足之势，虽然佛教文化始终没有进入到中国政治文化结构的核心层次，但其在文学中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悠久的，甚至比儒、道两家文化精神的影响更加巨大，更加突出。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摧毁旧文化、旧道德为己任，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倒是一直处于政治文化结构之外的佛教文化受到知识分子的尊敬，并被用以作为沟通新型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一座桥梁。可见，佛教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体现着中国文学的大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小传统之间的承袭，同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和新文学作家的漂洋留学，基督教的文化精神也渗透到了新文学的主题创意与人物塑造等环节之中，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文学的大传统所缺乏的，体现着现代文学的小传统与中国文学大传统相区别的突出特征。既然无论是承袭还是区别，宗教文化都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研究宗教文化的价值理念在现代文学传统的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

第一节 现代文学起源中的宗教文化背景

每一种新兴文学运动的开展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文化背

景，这种背景一方面为文学运动提供所需的思想理论资源，一方面也对文学运动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予以制约和限定。中国现代文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这一文学运动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结果被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一是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兴起；二是西方近代进步人文思潮的大量输入；三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马列主义的传播。这种概括本身是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但仅仅只看到这三个方面而不再顾及其他，则暴露出了意识形态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的局限性。其实，上述三种概括主要是着眼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背景，而新文学的兴起虽然被包容在新文化的范围内，但它的发生发展除了新文化这一共同的思想背景外，毕竟还应该有自己的所仰仗的独特的思想资料。我认为，宗教文化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依赖的独特的思想资料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出于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目的，对宗教是持猛烈的批判态度的，而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却大多在情感上对宗教文化抱有好感，从这一悖反现象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到宗教文化背景对现代文学起源的独特意义。台湾学人周锦早就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他说：“宗教的传入，助长了新文学运动。中国两千多年来维系社会人心的是儒家思想，根本没有宗教，因此对于任何传入的宗教既不热烈地欢迎，也不会仇视地加以抗拒和排斥，因此成了热心教务的传教士们向往的地方。传教对象是广大的社会群众，所以经典的翻译多是明白浅显，而成了白话文的先驱。至于佛经里的偈语，对中国旧诗来说，确是极其精练的表现。而基督教的唱诗，更直接引导了白话诗的创作路线。各种宗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人心，究竟有过多大的影响，虽然见仁见智，但是对于

新文学运动所提供的帮助，是应该可以确定的。” 很可惜的是，这种意见至今仍未在国内现代文学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更不用说深入的探讨了。

宗教文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文化背景，主要显示在两个方面。一是晚清佛学复兴运动。有清三百年间，佛教日渐式微，不仅教内大德依稀，佛学研究也止步不前。直到晚清才由一些学养深厚的居士与一些政治上的维新派人士联手打破佛学研究的沉寂局面，在国内掀起一股颇有点声势的佛学复兴思潮。当时的新派人士几乎没有谁不谈佛学的，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杨度等都在佛学修为上显示出很深的造诣。他们的佛学思想与本题无关，在此不予论列，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些新派人士在谈佛论佛时呈现出的鲜明的启蒙性特点。启蒙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从维新派开始就为这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所言说。如果说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言说启蒙主题时都有自己的话语模型的话，那么，20世纪初叶的新派人士们启蒙言说的话语模型就是佛学。谭嗣同以佛学之唯识宗、华严宗为思想基础，将科学哲学宗教熔为一炉，成《仁学》一书。而《仁学》宗旨，在于冲决网罗，这是典型的启蒙之声。所以梁启超赞他的《仁学》“尽脱旧思想之束缚，” 钱穆也说：“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 梁启超谈佛学也与谭嗣同一样是以唯

周锦：《中国新文学史》，长歌出版社，1976年出版。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5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1947年出版。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68页，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识为宗，大倡心学。而之所以选择唯识宗作为学佛的入门之径，则是因为唯识宗主张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学佛在于积真智求真信，转迷成悟，转识成智，这种道理颇与时代的启蒙精神相合。尤其是梁启超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把佛教的振兴同群治联系起来，极力赞扬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俨然是将佛学视为国民精神启蒙的一大利器。较之梁启超，章太炎学佛的启蒙目的更为显然，他在三十岁时始读佛典，但未有专精，后因苏报案下狱才开始精心研读《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著作，可见其研读佛学是与其革命生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此，章太炎在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立即鼓吹要以佛教来发起国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其理由就是，“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而在佛学义理的研究中，章太炎特别强调的也是佛学的“自贵其心”、“依自不依他”的自觉精神，要发扬这种精神来养成勇猛无畏的大人格。如果个个人都能自贵其心，依自不依他，那么中国的革命也就无往而不胜了，这大概是当时学佛的新派人物一个共同的想法。所以，有学者评论说：“在中国近代佛学思想中，虽然仍有继承以往的佛学思想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它还具有着明显的不同以往的佛学思想的新的时代特征——在这些新的时代特征里，既有某些目睹时艰、忧心国事

的志士仁人们想从佛学思想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苦心探索，又有‘西风东渐’、因而西学影响于佛学的若干反映，以及某些佛学大师，基于紧迫的时代感，以改革者的姿态，力图赋予佛学思想以新意。”

以谭、梁、章等在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以现代第一代文学家们同他们之间的密切的师生关系，近代这批新派人物将佛学复兴同国民启蒙结合起来的的思想，无疑是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所倚赖的主要的理论资源之一。关于在佛学思想上现代作家对近代大师们的继承问题，我在拙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已经详细论列，在此我想从启蒙主义话语生成与思维定向的角度，重点分析一下现代作家是怎样吸取与运用这一理论资源的。首先，现代启蒙主义者重视言说启蒙者对黑暗与无明的体验，这种言说无疑来自于佛学的启示。无明是佛教义理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术语，据说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曾遍参明师，但终无所获。于是在毕钵罗树下东向跏趺，静思默察，从十二因缘往上逆推，得出无明乃是人生苦痛的最根本原因的结论，这一结论的获得是释迦牟尼成佛的标志，也是佛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基石。黑暗即是无明，无明就是不觉悟，现代作家将这一佛学概念引进自己的启蒙言说与思考，一方面在自己的创作中特别地突出精神上的愚昧无知与黑暗状态是民众的苦难之源，如鲁迅的小说几乎很少重笔去写下层民众物质上的匮乏贫困，祥林嫂死于她的迷信与贞节观念的束缚，华小栓死于父辈的愚昧与冷漠，悲剧都是来自于精神的黑暗。另一方面，现代作家特别喜欢用黑暗来形容自己置身其中的精神状态与人

文环境。鲁迅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许地山的在“暗夜”行路谁也没有带着灯下来等等，显然都是有关启蒙者生存状态的一种佛学表达方式。其实，鲁迅这一代五四新文化启蒙者与谭、梁、章等近代启蒙者是不一样的，近代启蒙者往往是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启蒙，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也不会直接面对群众的精神状态，他们只需要滔滔不绝地向群众表述他们信奉的先进文化观念就可以了，而鲁迅这一代启蒙者是艺术型的启蒙者，他们启蒙言说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实现。这种方式决定了他们必然要直接面对群众的精神状态，他们对群众的精神上的黑暗与无明有着切肤的亲身体验，对自己身边的环境的黑暗与无明也有着深刻的自我咀嚼。正是这种特点使得现代启蒙者从近代前辈们那里获得了启示，但同时又在启蒙的深度方面超越了近代的前辈。其次，近代大师如梁启超等虽然自己属于政治型的启蒙者，但对文艺作为启蒙的利器却有很深刻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也是源之于佛学的启示。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从佛学的“熏习”理论出发，认为小说对于人心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功效，而中国国民的轻薄无行、多愁多病等种种人格缺陷与精神病状都与中国小说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梁启超大声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20多年后，鲁迅称自己之所以写小说，是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他认为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并且指责“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自己不觉得。”而周作人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更是将中国古代神魔、狭邪、才子佳人小说通通划入非人的文学。可见，这两位坚定的现代启蒙主义者在文艺与启蒙的关系上，其认识与梁启超的思路何其相似！

如果说现代文学起源中的佛教文化背景主要来自于近代佛学复兴运动的启迪的话，那么，现代文学起源中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则主要来自于现代作家自身学养的形成。基督教文化早在唐朝就已传入中国，但其传教历史时断时续，没有明显的发展。只是在近代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随着西方军事势力与经济势力的大量侵入，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才突然迅猛发展起来。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评价，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议题。我所关注的是基督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关系，是基督教文化怎样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起源的背景框架中。在此问题上，梁启超曾有一段论述：“基督教本与吾国民性不近，故其影响甚微。其最初传来者，则旧教之耶稣会一派也。明士大夫徐光启辈，一时信奉，入清转衰，重以教案屡起，益滋人厌。新教初来，亦受其影响。其后国人渐相安，而势力在欧洲已日杀矣。各派教会在国内事业颇多，尤注意教育，然皆竺旧，乏精神，对于数次新思想之运动，毫未参加，而间接反有阻力焉。基督教之在清代，可谓无咎无誉。”梁启超在此是从学术史角度来谈基督教文化对中国近代社会之影响，而且是在充分肯定近代佛学复兴思潮之后顺带提及，较之时人将基督教文化的侵入视为洪水猛兽的观点而言，“无咎无誉”之评价应说是比较公允的。不过说基督教文化对于中国的新思

想运动，毫未参加，则是一种很浅表的观察。且不说伴随着传教而来的科学技术本身对人们认知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促动，世纪初流行的女子天足、女子教育等运动大多是教会人士所发起的。梁启超实际上也看到了基督教在中国“尤注意教育”这一特点，我认为正是这一特点使基督教文化俨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不仅是指周锦先生曾分析过的译经所用的通俗语体文为五四新文学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可贵的群众基础，而且是指基督教在教育方面的发展为现代文学的发生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从与基督教文化接触的关系之疏密程度来看，这批中坚力量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留学过程中精读过《圣经》者，如周作人曾借《圣经》以学外语，因此而对基督教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郭沫若在日本念书时“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作日课诵读。”这一个层次的作家是相当广泛的。二是在各类学校中学习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过教会活动的，如胡适在美国留学时一度很热心于教会活动，在1913年还写过一首《耶稣诞节歌》抒发自己参加宗教节日聚会的新奇感受。虽然后来胡适拒绝了友人介绍他加入教会的好意，但教会的活动对他青春期人格的形成其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三是严格受过教会学校教育训练的，这一层次的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不算少数。王本朝在其《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一著中曾列举了冰心、许地山、庐隐、萧乾、林语堂、张资平、陈梦家、陆志韦、熊佛西、余上沅、梁宗岱、杨刚、张秀亚等，其实这只是一个很不完全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文学与宗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0卷，第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的名单。从教会学校毕业出来的中国学生像陆志韦那样声称自己是“耶稣的信徒”的固然不多，但像萧乾那样最终走向反基督教的也是极为个别，大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只是在人格、信念、性情以及文学素养诸方面深受基督教文化的熏染。从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关系来看，这三个层次的综合非常具有事实的说服力，因为这三个层次不仅囊括了现代文学中的大多数知名作家，而且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现代作家在吸取基督教文化方面所表现出的主动性与非宗教化特征。“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

第二节 现代文学传统中的宗教价值理念

文化传统是经过不断地重复而积累、稳定下来并且被后来者所继承的一种精神现象。以这一标准来判别，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有三个表现突出的传统，一是人道主义，二是激进主义，三是大众化。这三种文化倾向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就已经形成，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历史中以各种形式或内涵不断地重复着。一般说来，每一种文化传统的形成都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基础，人道主义的价值理念基础是个人本位，激进主义的价值理念基础是革命至上，而大众化的价值理念基础则是平民优先。从过去学界对这些文学传统的研究来看，这种归纳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疑义了。不过，传统本身是

据我所知，应该添加上去的名字还有张爱玲、王统照、苏雪林等。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 第3号。